

GUDAI YUYAN MINGPIAN XIPING

# 古代寓言名篇析评

张学忠 编著



语 文  
社

92

社

GUDAI YUYAN MINGPIAN XI PING  
古代寓言名篇析评

张学忠 编著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GUDAI YUYAN MINGPIAN XIPING  
古 代 寓 言 名 篇 析 评  
张 学 忠 编著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文联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 6  $\frac{1}{4}$  印张 130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7240·072 定价：0.95元

## 编写说明

解放以来，在古代寓言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最近四、五年来，更有可喜的进展，一些研究者开始发掘和整理先秦以后各个时期的寓言，而且注意到其他文学品类中的寓言，诸如讽刺小品、杂文、诗歌、辞赋、笑话以及小说中的寓言作品。其实，从我国近三千年寓言发展的历史来看，它的种类是多样的，从故事、散文、诗赋、笑话及小说中，都能分门别类地理出一条线来。当然，其中最为主要的还是散文。毫无疑义，寓言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单是历代文人所写的寓言散文就可以编成一部很可观的集子。这对于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继承，对于寓言乃至古代散文发展状况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都将大有裨益。本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编写的。

本书所选辑的都是历代文人创作的独立成篇的散文性质或接近散文性质的寓言作品。凡附属在各种古籍中作为修辞手段或说理成分的寓言片断，概不包括在内。编选者断断续续花费近两年的时间，翻阅了近百种古代名家别集，还有各个时期的文章总集和选集，上起西汉，下迄晚清，几经拣择，最后选出了三十一位作家的四十三篇作品。在编选过程中，大致遵循了以下几条标准：（一）作品有一定代表性，在当时或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二）既注意思想性，也注意艺术性；（三）注意作品体式的多样化，不局限在人

们所熟悉的少数几种体式里；（四）所选作品按年代排列，并尽可能兼顾各个历史时期，以反映寓言散文发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在体例上，本书以所选作者为纲，依次分为“小传”、“选文”、“注释”和“析评”四部分。“小传”尽量附上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概况，有助读者阅读和理解；“选文”一律用全文，标明出处，以便读者查找与核实；“注释”力求翔实，特别注明典故的出处和演化的情况，尽量给读者一个完整的概念；“析评”则不仅分析内容，也欣赏艺术特色。同时还有意识进行比较，或者从散文史的纵横两方面比，或者结合作者其他作品比，或者联系外国寓言比，尽可能吸取前人或时贤的研究成果，认真从新角度发掘作品的含义，以扩大读者的视野，丰富读者的知识。

本书虽只限于文人寓言散文的范围，然而所涉及的时代较广，资料繁富，加之编选者能力与水平所限，欠妥与疏谬之处或许难免，愿就正于读者。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校吴云副教授曾对此书稿提出过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忱。

一九八五年十月于天津师大

## 前　　言

所谓古代寓言散文，是指文学史上用寓言形式或手法创作的一种特殊文体。从广义上讲，这种文体包括先秦到明清时期各种非韵文的寓言作品，而从狭义上讲，则主要是指独立成篇的具有（或接近于）散文性质的寓言故事、寓言传记、寓言小品、寓言杂感之类。这里仅论述狭义寓言散文。

作为寓言散文，它的最初的形式，都是简短的民间寓言故事。这种故事大约在原始社会后期即已产生，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也没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到了奴隶社会后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方面由于长期流传的寓言故事愈益增多，并愈益显出它的特有的富于形象性和讽喻性；另一方向由于政治、外交以及学术竞争的需要，统治阶层、特别是士人，为了使自己的言论和著述更富有说服力与鼓动性，便喜欢引用民间寓言故事，或根据需要又创作出许多新的寓言故事，这就促使春秋战国时期的寓言空前地发达起来，并体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有关国家政事的多、有关统治术的多、有关哲理的多、有关讽谏的多，充分地利用了寓言的形象性、喻理性和讽喻性。

但是，大量从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寓言故事，它们主要是作为各种散文的附庸而存在的，还没有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作为独立文体的寓言散文，应该是发端于战国后期。当时有的子书以资料汇编的形式保存下来相当可观的寓言，

如《韩非子》中的“说林”上下篇和“内储说”、“外储说”，这些寓言已经具有独立的性质，可以说这是独立成篇的寓言散文早期形式。

到了秦代，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兼以“焚书坑儒”又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所以作为先秦式的寓言相对地衰微了，只是在少数倡优的口头上还保存着一些讽谏性的寓言。

汉代是寓言文学开始向新的方面发展的一个时期。汉初赋体文十分兴盛，受它的影响，出现一些赋体的寓言散文，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这两篇赋（实为一篇），以寓言手法，通过子虚、乌有先生和亡是公的对话，叙述和张扬了楚、齐二地的苑囿和帝王的游猎之事，寓有讽谏之意。它是文人寓言散文的一种雏形。继司马相如之后，虽然出现以“文”命名的寓言体之作，如王褒的《责罿奴文》等，但基本上还是赋体。汉代真正以散文形式来写寓言作品的，当首推刘向。他有《新序》和《说苑》两部子书，是受《韩非子》内、外“储说”和《吕氏春秋》影响而编写的，收录了西汉以前大量传说和名人轶事，其中有不少篇章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寓言性质。象《叶公好龙》、《狐假虎威》、《桃偶与土偶》等篇，更是诸作中的优秀者。不过，它们还是属于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依然不是完全独立的散文作品。

刘向之后，又出现少量带有寓言散文性质的赋，较有代表性的是扬雄的《逐贫赋》和张衡的《髑髅赋》。它们不象《子虚赋》、《上林赋》那样铺张扬丽，语言也比较趋向散文化，对东汉以后的寓言赋有相当的影响。

魏晋六朝时期，由于玄学兴起，宗教盛行，清谈成风，

以及志怪小说、寓言笑话的影响，纯文人寓言散文性质的作品也稍见其多。主要有曹植的《鵩雀赋》、《髑髅说》、《释愁文》，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张敷的《头责子羽文》，左思的《白发赋》，陆云的《牛责季友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梁简文帝的《玄虚公子赋》等。其中比较出色的是《鵩雀赋》和《桃花源记》两篇。前者以拟人手法写鵩与雀对话和雀与雀对话，影射曹丕、曹睿父子企图加害作者的事实。文字虽系赋体，但很通俗，应属散文赋类。至于《桃花源记》，则是一篇别开生面的作品，通篇使用散文语言，既有虚、又有实；既有叙述、又有描写，摆脱了以往寓言散文多用对话或偏重铺叙的倾向，文学意味大为增强。当然，它毕竟还是同“桃花源诗”并存，多少带点“序言”味的作品。

完全独立成篇的寓言散文，当推唐初王绩的《醉乡记》。这是一篇大致受了《桃花源记》影响的作品。文章的开头写醉乡的风俗人情，中间写黄帝乃至阮籍、陶潜等人对醉乡的向往，末尾点出“醉乡盖古华胥之国”这一寓意，表现作者对平静、淳朴社会的憧憬，初步具备了寓言散文的特点。

同王绩的《醉乡记》相比，唐中期韩愈的寓言散文，有了明显的提高。《毛颖传》、《送穷文》等篇，无论从结构的严谨、故事的生动，还是从语言的谐美来看，都是具有鲜明文学性质的寓言散文。历来不少评论家都认为韩愈的寓言散文带有浓厚的游戏性，主要是寄托个人的怨情，从而低估了它的社会价值，其实这是片面的。

寓言散文真正被重视、并臻于成熟，是从柳宗元开始的。这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唐代中期日见衰颓的社

会现实，为长于讽刺的寓言散文这一文体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二）柳宗元是永贞革新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把寓言散文作为一种武器，针砭社会现实，并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三）柳宗元同韩愈曾大力提倡古文运动，创作寓言散文也是实践其宗旨的标志之一；（四）唐初以来，文化发达，思想活跃，佛经对文学的影响增强，加之柳宗元本人的文才，也都为寓言散文的成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柳宗元的寓言散文创作，要比以往任何作家突出得多，约有二十篇左右。如《罴说》、《蝦蟆传》、《三戒》等。这些作品，大致具备四个特点：1. 强烈的政治性和鲜明的社会性；2. 善于用传奇笔法作生动细致的描写；3. 有浓厚的讽刺格调；4. 形式活泼。可以说，柳宗元是中唐以前创作纯寓言散文最有成就的作家。

与柳宗元同时代又持同样政治态度的作家刘禹锡，也曾创作了部分寓言散文。他有《因论》七篇，虽然自己在序言里声明是“匪立匪寓”，而实际上还是属于寓言。特别是其中的《鉴药》、《讯娘》、《叹牛》和《说骥》等篇，尤为突出。其中大都通过写物写事而讽喻世态人情。

柳宗元与刘禹锡等人的寓言散文，直接影响了晚唐皮日休、陆龟蒙与罗隐等人的散文创作。皮、陆、罗三人都是仕途上不甚得意，并且不满现实的文人。他们接近下层，深知社会的疮痍，写出不少砭刺现实的小品，这些小品中正有一部分属于寓言散文。三人的寓言散文在风格上比较接近，既尖锐又泼辣。其中罗隐有小品集《谗书》五卷，共收散文六十篇，约有三分之一是寓言散文，锋镝尤为犀利，成就当在皮、陆之上。应该指出，皮、陆、罗寓言散文是晚唐小品

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宋乃至辽金时期，寓言创作除了大致延续唐代的特点外，又较多地利用了寓言的喻理性的一面。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欧阳修、司马光、王令和苏轼的作品。欧阳修的《伐树记》、《养鱼记》，司马光的《蚕说》、《拾樵》、《饭车》，王令的《马说》、《医谕》，苏轼的《日喻》、《黠鼠赋》、《杜处士传》、《万石君罗文传》、《江瑶柱传》、《黄甘陆吉传》、《黄叶传》以及《温陶君传》等篇，均系寓言散文。苏轼的寓言散文同他的一般散文风格相近，笔法迭宕，长于议论和说理，对后世尤其是明代说理性寓言散文有相当的影响。苏轼还写过一些小品，也时有寓言散文色彩，如《二鱼说》等。旧时传说苏轼所撰写的小品集《艾子杂说》，虽然包含一些较好的寓言散文，但实际上出自他人之手。

欧阳修、苏轼之外，宋初的王禹偁以及后来的宋庠、秦观、晁补之、萧德藻、陈搏良，直到辽金之间的元好问和宋元间的邓牧等人，都有少量的同类作品，然而其成就都未能超过苏轼。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涌现出大批笔记文学作家，如邵伯温、范（陈）正敏、洪迈、王明清、徐铉、罗烨等，他们的笔记作品《见闻录》、《遁斋闲览》、《夷坚志》、《齐东野语》、《玉照新志》、《稽神录》与《醉翁谈录》等书，均夹有一些寓言故事，其中有的也属于寓言散文，这类作品对后世文人创作曾有一定影响。

寓言散文到元末明初，又呈现出一个新高潮，这主要是宋濂和刘基的贡献。元末在政治、经济乃至用人等方面所表

现出来的衰势以及整个社会的动荡与混乱，致使不少怀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士人深感颓唐，他们或出于民族气节，或出于当路的压抑，而不满于现实，于是颇多针对现实的散文之作，宋濂与刘基正是这类士人中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当时的文章钜公，都曾经在隐居山林的时期特意撰写子书。宋濂有《龙门子凝道记》，刘基有《郁离子》。前者包括小品散文一百二十篇，后者包括一百九十五篇，其中多为寓言散文。宋濂另有《燕书》十六篇，《寓言》五篇；刘基另有《问答语》四篇，《菜窝说》、《送穷文》、《拙逸解》各一篇，也属于寓言散文。他们散文的共同特点是：（一）是不得意时所作；（二）有政治家的微言大意；（三）善于议论和说理；（四）喜欢采用“××子曰”的形式。其不同点是：刘的作品涉及面更广博、针对性和托讽性更鲜明，笔法更活泼，文字也更深隐典雅、特别是有浓厚的哲理性。这也就是说，刘基的寓言散文又比较全面地利用了寓言的“三性”：形象性、喻理性和托讽性。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是创作寓言散文数量最多的两位作家。

明代中后期，乃至有清一代，由于文化统治的加强，特别是文字狱的威胁，迫使作家不能不更多地使用婉曲隐晦的写作方式。寓言散文由于其自身的特点，适得其用，于是涌现出相当数量的善于写这种文体的作家。他们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世态人情有所不满，或者仕途上不甚得意，有一定正义感的文人，如明代的方孝孺、贝琼，清代的侯方域、蒲松龄、戴名世、汪应铨、张九键、龚自珍等。虽然各自的寓言散文都不算多，但都有鲜明的讽喻风格，其中尤以龚自珍最为突出。另一类是以笔记、讽刺笑话或其它文体见

长的文人，如明代的耿定向、陆灼、刘元卿、江盈科、赵南星、冯梦龙以及清代的钮琇、石成金、袁枚、纪昀等。他们所编撰的笔记、小说、笑话集，如《权子》、《艾子后语》、《应谐录》、《贤奕编》、《雪涛小说》、《笑赞》、《古今谭概》、《觚膝》、《笑得好》、《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等，也有一部分寓言散文。这些作品继承并发展了以往讽刺文学的政治敏感性、深刻的现实性以及活泼的形式与技巧，是明清讽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艺术风格又大都不同于一般的寓言散文。

寓言散文的正式产生和发展，不仅丰富了古代散文的种类，而且标志着古代文学的又一个进步，反映作家们在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与表现生活方面更加深刻和敏锐，在写作的技法方面也越来越明显地趋于熟练和多样化。

# 目 录

编写说明	(1)
前 言	(1)
列向	(1)
叶公好龙	(1)
曹植	(5)
鵩雀賦	(5)
陶渊明	(10)
桃花源记	(10)
韩愈	(16)
毛颖传	(16)
送穷文	(23)
柳宗元	(31)
罴说	(31)
蝟蠍传	(34)
三戒	(36)
刘禹锡	(46)
说骥	(46)
无能子	(52)
鸩说	(52)
皮日休	(55)
悲摶兽	(55)
陆龟蒙	(59)

招野龙对	(59)
罗隐	(65)
说天鸡	(65)
荆巫	(68)
王禹偁	(71)
录海人书	(71)
苏轼	(76)
黠鼠赋	(76)
日喻	(81)
河之鱼	(85)
无名氏	(88)
鬼怕恶人	(88)
秦观	(91)
二侯说	(91)
萧德藻	(95)
吴五百	(95)
陈傅良	(99)
怒蛙说	(99)
罗烨	(104)
互争高下	(104)
元好问	(107)
射说	(107)
邓牧	(111)
越人遇狗	(111)
宋濂	(114)
成阳膴	(114)

中山君嬖梁其生	(117)
刘基	(122)
即且	(123)
冯妇之死	(125)
汪罔人与僬侥人	(127)
卖柑者言	(129)
贝琼	(134)
猫戒	(134)
刘元卿	(137)
猫说	(137)
江盈科	(140)
妄心	(140)
冯梦龙	(145)
应声虫	(145)
侯方域	(149)
蹇千甲传	(149)
蒲松龄	(156)
责白鼯文	(156)
钮琇	(163)
谄虎	(163)
蓝鼎元	(167)
饿乡记	(167)
张九键	(175)
售画说	(175)
龚自珍	(179)
捕蜮第一	(179)

## 刘向

刘向（约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江苏沛县）人。汉楚元王刘交（刘邦同父少弟）四世孙。西汉元、成间任散骑宗正给事中，迁光禄大夫，曾负责整理校订宫廷藏书，是西汉著名学者。

刘向尊崇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也兼收其他学派如法家、阴阳家、墨家的思想主张。他反对外戚、宦官专权，曾因此而两度入狱。

汉成帝时，刘向曾受命整理古籍，得以博览群书，著述颇富。原有文集六卷，后来大都失传。所编《别录》，是我国最早的一本目录学之书（已亡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仅收赋、骚十篇，其它文章二十一篇。另有《新序》、《说苑》和《列女传》传世。其中《新序》十卷，《说苑》二十卷，共集西汉以前经、史、子书、传说故事及杂论千余则，多侧重于阐述儒家学说，是一部为封建统治者提供统治经验和理论的著述。其中有相当篇什都带有寓言性质。

## 叶公好龙<sup>①</sup>

子张<sup>②</sup>见鲁哀公<sup>③</sup>，七日而哀公不礼<sup>④</sup>，托仆夫而去<sup>⑤</sup>，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sup>⑥</sup>，犯霜露、冒尘垢，百舍重趼<sup>⑦</sup>，不敢休息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

龙，屋室雕文以写龙<sup>⑧</sup>。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sup>⑨</sup>，拖<sup>⑩</sup>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sup>⑪</sup>，失其魂魄，五色无主<sup>⑫</sup>。是叶公子高非好龙也，好夫<sup>⑬</sup>似龙而非龙者也。今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以见君，七日而君不礼：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sup>⑭</sup>敢<sup>⑮</sup>托而去。”

——《新序·杂事第五》

### 【注释】

①叶(yè)公好龙——本篇选自《新序·杂事第五》。叶公，即叶公诸梁，姓沈，名诸梁，字子高。叶，叶县（今河南叶县南）。

②子张——孔子的弟子，姓颛(zhuān专)孙，名师，字子张，陈人。

③鲁哀公——春秋时鲁国国君，公元前494—前467年在位。④不礼——不以礼遇。即不予接待。⑤托仆夫而去——托鲁哀公的仆夫代为转述，自己便离开了鲁国。仆夫，为国君驾驭车马的人，此处指侍从。⑥不远千里之外——不以千里之外为远。⑦百舍重(chāng虫)趼(jiǎn同“茧”）——走了百舍的路（一舍等于三十里），脚都磨出一层层茧子。极言远道而来的辛苦、专诚。⑧“钩以写龙”三句——钩，把它刻上龙；凿，把它刻上龙；屋内外凡能雕花之处也都刻上龙。钩，衣带钩。凿，“爵”的借用字，一种酒器。

一说凿即雕龙用的凿子。写，刻。以，介词，此处均省略宾语“之”。

⑨牖(yǒu有)——窗子。⑩拖——作施(yí)，即延伸。⑪还走——往回跑。⑫五色无主——五色，指青、黄、赤、白、黑，这里泛指面部气色、表情。无主，无法自我控制。⑬夫——那；那种。

⑭“‘诗’曰”句——出自《诗经·小雅·扊扅歌》第四章，原义是说：对所思念的君子，何时也不忘记。本文用以讽喻鲁哀公，意思是说：你心里如果真想着贤士，那么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接待。⑮敢——表敬副词，即冒昧的意思。